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玉琳.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的非遗实践——基于对恩施州的考察[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8(2): 37-44.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的非遗实践

——基于对恩施州的考察

张玉琳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非遗根植于民众生活实践,通过情感释放与集体狂欢激活公共文化空间,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文化价值。恩施州重构文化生态场域,通过传统空间功能再造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拓展文化服务边界;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多元协作机制,激发文化治理效能;优化非遗文化资源输送渠道,依托固定场馆、流动文化车与数字化平台实现精准供给。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实践的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恩施州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而且为基层文化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内生动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治理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2-0037-08

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生活之美的创造,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保护实践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近二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秉持“以社区为中心”的核心原则,强调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与实践能动性。^[1]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积极探索,在充分遵循这一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生态特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2]

当前,学界尚未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为满足人民基本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从社会公益性出发,向人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的一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3]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即由基层政府主导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政府主要指县、乡两级政府,是直接与人民群众互动的第一环。我国非遗保护体系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显著耦合特征:中国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四级名录体系是以县(市)级为起点的^[4],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则以县、乡两级为实施单元。有学者也曾提到,“公共文化的设施建设与作为公共文化项目和非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性质和功能上完全是匹配的,二者的结合将相得益彰。”^[5]可以看出,空间叠合与内容匹配为二者的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战略也在持续强化非遗保护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性关联。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21年,文化和旅游

收稿日期:2025-02-1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22CXZZ09)

作者简介:张玉琳(1996-),女,湖北巴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

部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丰富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6]，繁荣群众文艺^[7]，重塑乡村文化生态^[8]，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由此可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对保护与传承非遗、推动非遗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中，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了显著成效，却普遍存在“发展落后”“区域差异”“形式单一”“功能缺失”等矛盾。^[9]非遗传承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弱互动”状态：区域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导致服务供给均等化受阻；场馆式保护模式难以适应非遗活态传承需求；行政主导机制挤压社会力量参与空间。非遗如何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学者们分别从体制机制改革、非遗传承人保护、艺术普及、数字化工程、人才培养等维度展开研究。然而，既有的研究多聚焦宏观服务体系建构，对非遗在基层公共文化治理中的特殊作用机制探讨不足。本研究选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作为个案，源于其文化生态的典型性与实践创新的示范性。恩施州作为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文化交汇带，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有 15 项国家级非遗，其高山峡谷式地理单元为研究非遗原生性保护提供了理想样本。同时，恩施州构建了非遗保护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州、县、乡、村四级网络发展模式，其“非遗+”模式创新实践具有显著的示范价值。基于此，本研究对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共通性进行考察，探讨非遗的特征及其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相匹配、相适应的问题，以期更好地保护与传承非遗。

二、互动根基：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耦合

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根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植根乡土、服务大众的人民性特征，其二是情感释放、雅俗共赏的自娱性特质，其三是传承文明、教化育人的教育性功能。

（一）人民性：公共文化里的主体性

人民是非遗的创造主体，是非遗传承发展的行动主体和受益主体，“非遗所具有的民间性与共享性特征，彰显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人民性价值，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保护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10]。同时，

非遗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形式，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有着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非遗产生于群众的生活场域，群众既是创作主体，也是传承载体，其艺术价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导向；其二，民间文化艺术曾经长期被视为“下层艺术”“野生艺术”，遭受主流文化的排斥，直至近代，进步文化工作者重新发现其价值，这一转变实质上是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对象化”^[11]，有明显的物质性，包含生产实践活动。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非遗，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延，是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艺术形式，以集体性创作维系民族文化基因。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文化供给，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以人民群众为核心服务对象。“为人民群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加快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早在中世纪，卡斯特尔维屈罗就意识到，诗人和艺术家要想作品受到欢迎，就必须考虑将人民大众作为文艺的对象。^{[13] (P179)}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性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因而，非遗的群众创作本质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民导向具有天然契合性。利用非遗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推力，人民群众的参与互动是基本前提之一。例如，恩施扬琴非遗传承人周金福创办社区工作室，组建老年表演队和民间琴会，创作历史、传说题材剧目，成为当地非遗保护的重要模式。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核心要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群众文艺的精神体现。从社会治理视角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为群众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制度化的实践场域。文化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为基层政权提供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效途径。^[14]村民从被动接受文化服务转变为主动创造文化内容，通过非遗项目创编重构集体记忆，重构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亲缘关系，增强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国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尊重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这不仅有利于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自娱性：狂欢精神下的民众表达

非遗的创作与表演虽扎根于现实生活，却又超脱于现实的刻板约束，成为民众自我表达的独特渠

道。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认为,民间文化具有颠覆传统、打破等级、追求自由平等的特性。在狂欢节期间,特有的时间被打破,有全民性的亲昵空间、怪诞的躯体语法和“广场话语”,平日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被暂时搁置,人们不分贵贱,以诙谐、戏谑的方式进行互动,各种禁忌被打破,形成了一种全民性、包罗万象和乌托邦的狂欢氛围。^{[15](P6~12)}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非遗为民众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异托邦,从传统庙会、社火到现代广场舞、社区文艺活动,这些文化实践都深刻体现了民众的自娱性需求。在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中,社会身份差异被消解,个体得以真实地展现自我,实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模式不仅满足了民众的文化需求,更创造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文化场域。在非遗构建的奇妙世界中,民众通过自娱自乐的艺术实践,实现了对现实规约的暂时性超越,获得“替代性”的情感宣泄与心理补偿。那些充满夸张、幽默、趣味的非遗元素,实际上是民众欲望的符号化表达,民众在这自娱天地里找寻到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由与平等。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戏剧演出形式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心于民间广场的狂欢节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文化的基本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一般说也不能纳入艺术领域,它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16](P8)} 这种文化特质在非遗的展演实践中同样得到了印证,无论是中世纪的广场戏剧,还是当代非遗活态展示,都是通过特定仪式化的公共展演构建和激活集体参与的开放性文化空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自娱性表达提供了展演空间,要让民众接受这个空间,必须构建具有文化认同价值的精神场域。相较于专业艺术形式,非遗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具有以下特征:其一,表演形式的原生性和朴素性降低了参与门槛;其二,即兴创作特征增强了空间适应性;其三,内容的生活化提升了民众的参与度。这些特征使非遗能够有效调动民众的感性力量,实现集体性的文化狂欢。

恩施州土家摆手舞相对于其他流行艺术而言,较为简单易学,舞者通过“同边顺拐”“双手摆动”等动作,在重复韵律中构建集体记忆,将传统祭祀性舞蹈转化为现代节庆符号,通过农耕场景再现(如撒种、推磨)强化文化本真性。在恩施女儿城实景演出中,游客不需要专业的表演技巧,也能和演员一起舞蹈,形成狂欢景观,这一传统舞蹈从仪式空间进入公

共文化场域,实现了活态传承与文化惠民的双重目标。因此,非遗通过独特的娱乐功能,构建了一个群体性的文化空间,赋予了公共文化服务场域以特殊的意义。可以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娱乐系统。

(三)教育性:艺术普及中的价值传递

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一切文化活动,在广义上都可以说是教育的。”^{[17](P588)} 非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演化和传承。将非遗融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需深入考量其文化特征,制定出适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题和产品,才能使其更好地成为寓教于乐的载体。从我国整个艺术教育体系建设中可以看出,非遗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在高校理论研究中,非遗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口。正如钟敬文先生所强调的,非遗因其与学校不怎么产生关联而能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从而帮助人民加强对中国文化特征的认识。^{[18](P30~31)} 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正是利用了非遗的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对基层进行文化建构的。

在知识传递上,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构建了一个以文化为媒介的教育系统。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作为重要的文化教育载体,通过公益性开放和多样化服务供给,如流动文化服务、艺术培训、主题展览等,不仅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更构建了一个文化互动的公共空间。恩施州来凤县文旅局组织人员创作以时代楷模张富清先进事迹为蓝本的大型非遗南剧《本色》,开展专项演出、巡演、汇报演出。该剧将人民公仆的内在信仰和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艺术创作极具张力,在写实与写意的观照下,展现了张富清这一具有崇高美的人物形象,唱响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旋律。再如利川小曲《书记重上青松岭》、恩施扬琴传统曲牌“精准扶贫”专题剧目《再访吊脚楼》等非遗作品都立足现实,使人民群众得到进一步的精神洗礼。这些服务内容满足了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且为基层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在休闲娱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社会伦理和地方性知识的认知,以及精神文化的塑造。^[19] 这种教育模式使民众在技艺学习的同时,深化了对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理解,强化了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就审美维度而言,审美教育作为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具有特殊意义。非遗以其独特的符号体系、色彩搭配与表现形式,为基层民众搭建起感知美的桥梁。恩施市老

城区的民族民间工艺传承基地,设有漆器髹饰技艺、西兰卡普、竹编技艺、吊脚楼营造技艺等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在非遗传人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制作方法。这类非遗展览、展示体验活动,使民众从直观的艺术感知逐步深入到审美理解,实现审美能力的层级式提升,这一过程体现了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审美教育规律。针对民众艺术认知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足等问题,基层文化机构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艺术培训和知识传播,帮助民众建立艺术认知框架,培养审美判断能力。这一过程不仅为基层艺术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因此,非遗通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这一载体,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多维传导,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教育生态系统。

三、实践路径: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多维协同

(一)空间生产:文化生态场域的重构

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域中,非遗的介入实践首先表现为物理空间的改造,主要通过传统空间功能再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等方式,重构基层社区的物质景观,引发公共空间的功能转型。空间生产主要有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传统空间功能再造。非遗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功能再造,本质上是应对文化治理结构性矛盾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呈现“去同质化”特征:既要求保留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传统民俗框架,又渴望获得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化表达形式。这种张力推动传统空间从单一功能场所(如祠堂、戏台、院坝)向复合型文化容器演变,通过空间叙事重构实现文化记忆延续与当代价值再生产的双重目标。将传统单一空间改造为“固定+流动”的混合场域:固定场所承担文化展示、技艺传习功能,流动形式(如巡演、快闪)进行文化传播。如传统工艺、美术类非遗主要以原型复制品、微型模具、场景仿真等形式呈现,这两个类别有着丰富的物质载体,其原料、工具、工艺流程、不同阶段的半成品和成品都有相对容易实现的展陈方式。同时,这两个类别所涵盖的工艺美术品和日用品与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所反映的民间审美旨趣和地域文化特色能够激发受众的亲近感,且符合展馆的静态特征。恩施州各县市非遗展示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立体化呈现空间,通过物质性载体与数字媒介融

合的展陈策略,构建起多维度的非遗认知场域。如复原西兰卡普传统技艺的生产性场景;制作微型吊脚楼模具;建立数字交互系统,通过可触摸式电子屏,实现非遗资源可视化查询等,使参观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对恩施州各地区非遗文化整体样貌的系统性认知。传统舞蹈、戏剧、曲艺、音乐类非遗由于自身的表演属性,在巡演中表现出群体性活态动的特点。如通过对会议精神、价值观宣导进行艺术化转译,创新理论宣讲形式,将政策话语融入恩施三棒鼓、扬琴说唱等民间曲艺,举办主题非遗展演活动、专门赛事等。这种空间弹性设计既能维系文化场所的神圣性,又可突破物理边界,实现文化辐射。功能再造的终极价值在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这种空间再生产不仅提高了物理空间使用效能,更重要的是重塑了文化生产的完整生态链,使非遗真正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活性细胞。

第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建设非遗主题馆、非遗工坊等特色空间,构建集展示、体验、传承于一体的文化载体,并运用数字技术拓展虚拟文化空间。2015年《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当地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族歌舞、传统体育比赛等民族民俗活动,打造基层特色文化品牌。”^[20]这一政策标志着非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地位开始得到正式认可。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方向。该文件强调,“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21]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度融合。^[22]这一政策为非遗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标志着非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角色从“融入”向“创造性转化”转变。2021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则进一步细化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的建设路径,明确提出,要“结合老旧小区和厂房改造等,创新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23]。这一政策为非遗的空间嵌入与场景营造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标志着非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实践进入了一个更为精细化的阶段。同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7]进一步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为非遗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恩施州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及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设立专项资金。宣恩仙山贡水兴隆老街上榜省级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十佳案例。核心项目恩施女儿城文化礼堂实施原址活化利用,打造“3456”功能区,含非遗传承展示基地、非遗小剧场、土家民俗博物馆 3 大场馆,教育、展览、体验、实践 4 个区域,5 条街巷,以及 6 个非遗大师工作室,形成“非遗+文旅+社区”融合发展的空间范式。综上观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改造传统场馆、构建复合型文化业态、打造主题功能空间等举措,已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空间再造与服务创新,可以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24],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二)主体协作:多元参与的治理网络

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中,政府始终肩负主导职责,而社会主体则依托各自的专业优势,通过差异化路径实现服务供给的多层次参与。具体到非遗保护领域,这一协同机制表现为: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充分凸显主导地位,社会力量运用文化资本开展专业化运作,同时通过培育文化自觉,有效激发群众的广泛参与,最终构建起政府统筹、社会协同、民众共建的协作网络。

1. 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依托于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同供给体系。在现行制度框架中,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而是通过立法、公共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为基础设施、产品服务提供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25]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二是依法依规组织实施非遗保护,三是开展非遗保护宣传和教育,四是建立非遗保护经费保障体系,五是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六是营造非遗保护利用的良好社会环境。^[26]因此,政府要从“提供者”向“服务者”转型,在宏观统筹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文化服务的公共属性,激活非遗资源的现代转化动能。

此外,政府在非遗实践中通过机制创新推动多元资本转化。首先,打造“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文化和旅游部实施的特色公共文化工程,通过整合地方文化资源,在丰富基层文艺生活的同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该工程依托

制度性保障措施,鼓励基层组建专业艺术团体,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以恩施州来凤县百福司镇为例,舍米湖村摆手舞队作为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展现出典型示范效应。这支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彭承金领衔的团队,年均开展 200 余场文化展演,其运作模式覆盖三个层面:一是参与政府主办的公共文化活 动,如省市级文艺汇演;二是开展在地化传承,定期在村摆手堂举行惠民演出;三是拓展市场化运营,通过商业表演创造经济效益,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增值。其次,创建“文旅农商”协同平台。如鹤峰县在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进行保护和利用时,通过“灵秀湖北·四季村晚”等活动,为社 会文艺团队、非遗传承人提供展示舞台,集中展示、销售民间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促进“文旅农商”融合发展,赋予传统村落更多文化内涵式发展活力。

2. 激发社会力量参与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但是,在市场化 的经济大潮中,非遗最终会被市场所考验,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够增强非遗供给的协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设施建设运营。”^[27]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服务的运行逻辑是由行业专业人员引导,实现系统化、专业化、组织化的运营。非遗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往往需要多个领域的配合,而这些社会力量主要由专业的文化机构、专家团队和企业组成。

专业的文化机构和专家团队是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智囊团。如恩施州来凤县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实行高校顾问制,对外,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形成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建设,构建一套稳定、有效的工作协同机制,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理论支持;对内,组织一批本土文化专家担任文化顾问,参与策划、创作文化精品,积极支持品牌打造,形成一系列精品力作,牢固树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牌意识,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企业对市场的变化有高灵敏度,更能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恩施州大力发展文旅融合,吸纳企业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使得非遗的供给更精准、高效。自设立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

范区以来,来凤县政府高度重视,创新思路,整合资源,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活力,通过招商引资,采取“建设-移交”(Build Transfer)的方式回购建成龙凤文化中心、龙凤体育中心等重点项目。宣恩县也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机构和企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如开展春节、元宵节非遗暨民间文艺大展演、全县群众广场舞展演等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可以看出,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企业、社会团体的介入,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还可以将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中,通过挖掘非遗多维价值,实现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产性保护,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8]

“社会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运行机制。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做出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力图把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参与结合起来,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协同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形成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共建共享的多元治理格局。”^[29]尽管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有不同的分配体系,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限制,通过社会力量的协作分配,可以让原本无法有效分配的非遗作品进入市场,实现社会化,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参与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非遗传承人在创作过程中会刻意调整自己的创作,以适应这种分配制度,这样互利共赢的局面让非遗传承人拥有了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

3. 唤醒民众主体自觉

布迪厄认为,惯习确定了某一场域里的一种立场,即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30](P164)}当非遗传承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场域,固有的专业惯习逐渐转化为大众惯习,形成新的实践逻辑,即“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自觉,促使群众积极参与。传统意义上,“艺术家”往往是对具有高艺术水平的专业人士的尊称。而“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说法意在打破这种定性,强调只要热爱并参与到艺术活动中,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艺术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为公众打造了全民美育的空间,增强了实现的可能性。认知是行为的基础。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印发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中提到,“积极扩大公众参与”^[31],重大改革方案、政策措施和项目建设要广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群众通过官方层面了解自身主体性,积极参与艺术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性情倾向系统,这是一种艺术存在的生成性能力,这一惯习为非遗服务

提供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动力原则。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真正察觉到这一“潜在机会”,向所有人开放,提供了公共领域和公共活动,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交流。^[32]在来凤县,这种逻辑转换体现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自觉运动,5000余名摆手舞骨干通过系统化培训带动3万群众参与。全民艺术现象在基层社会逐渐兴起,不断向各个阶层延伸,进而改变了群众对非遗的认识。巴东县组建的社区戏班,其成员构成包含教师、商户、退休人员等。定期排练展演不仅传承非遗,更重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使非遗实践成为社会整合的文化黏合剂。同时,随着短视频APP如抖音、快手的兴起,全民皆可成为“vlogger”,拍摄视频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士。线上短视频空间成了民众进行艺术创作、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恩施州撒叶儿嘴非遗大师谭学聪(抖音粉丝9.4W)、土家稀奇哥(抖音粉丝23.8W)等利用抖音平台拓展传播渠道。除了这些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之外,普通爱好者也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生活化演绎。以巴东非遗堂戏为例,有爱好者在抖音号上发布在家唱的堂戏片段,作为生活娱乐的方式。没有专业的打击乐,没有戏服,他们以枕巾、洗脸帕、浴帽等作为戏服装备的代替物。也有文化馆工作人员通过抖音号为群众免费教学摆手舞。用日常物品替代专业戏服的创造性实践,既保持了文化基因,又实现了当代转化。这种“专业-业余”的互动格局,实质是传承人主体地位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形成线上线下交融的立体传承体系。可以说,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实践中,群众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传承主体和创新力量。他们通过生活化实践和数字化平台,不仅延续了非遗的文化基因,还赋予其时代生命力。

(三)资源整合:非遗文化输送的效能优化

布迪厄将场域视为一种具有特定实践特征的社会空间,是参与场域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30](P144)}每个场域都有各自的行动者、行动空间和行动策略,最终在内外双重作用下达到融合的程度。非遗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输送可视为多场域的动态过程,其输送渠道可分为三重平台,即固定场馆、流动文化车和数字化平台。

1. 固定场馆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非遗资源的平台整合与空间配置构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配送的关键维度。在制度设计层面,恩施州通过构建四级文化设施网络实现空间结构化:州级“三馆一场”、县级“两

馆一场”、乡镇(街道)“三室一厅一场”、村(社区)“五个一”标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作为相对独立的动态生活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因此,实现非遗在基层文化输送的良性循环,应立足于这一场域空间。在治理实践中,恩施州通过“总-分馆制”创新实现文化资源配置的优化。其建构的“1+N”文化馆集群体系(以县馆为总馆,乡镇设立4个分馆)形成文化服务辐射网络。如宣恩县建设文化馆分馆四个(椒园镇文化馆分馆、长潭侗族乡文化馆分馆、高罗镇文化馆分馆、椿木营乡文化馆分馆),并定期举行滚龙连厢、薅草锣鼓培训以及荆楚文艺轻骑兵高腔山歌免费辅导培训。这种制度创新有效破解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其内在机理在于通过空间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重新配置。同时,非遗要素的场域嵌入呈现出符号化表征。恩施州各县市文化馆总馆设有非遗展示厅。非遗展览厅利用集中、整合的特点,以“原型-影像”的形式,通过场景再现、微缩景观、模拟物品、影像解说等形式,近距离呈现给参观者。这种提炼非遗符号,并将其物化于文化场所的方式,可以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衡,催生多样的展示空间,提升文化部门服务效能,提高群众获得感。

2. 流动文化车

流动文化车是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都有盲点。流动文化车一方面削弱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不公平与不均衡,另一方面实现了高山区和边缘区的服务盲区最小化。恩施州结合各乡镇的具体情况,按职能配备流动图书车、流动文艺辅导车、流动演出车、流动博物馆车或流动电影放映车等流动文化车,定期对流动文化服务车辆升级换代,并推行“流动文化”。流动文化空间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固定物理场域的动态空间,其独特之处在于扩大了文化服务方式的空间范围,增强了服务方式的灵活性。流动公共服务是政府主动“送上门”的服务,有别于实体的“一站式”服务。只有构建多元参与协作网络,才能充分发挥流动公共服务的功能。^[33]恩施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利用流动文艺辅导车、流动演出车定期送戏下乡,其中供给方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文艺团体。来凤县南剧非遗传习研究所积极响应来凤县文化馆的“戏曲进乡村”文化工程,于2021年联合县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体服务中心、乡镇文化传播公

司、翔凤镇、三胡乡、绿水镇等8个乡镇和重点贫困村,开展了“中国梦·文化进千家万户”“送戏下乡·文化扶贫”,全年共完成40次送戏下乡,观看群众15000人次,覆盖142个村庄、21个社区。可见,以“流动文化站+非遗大篷车”为载体,通过非遗传承人驻点指导、群众参与式体验等策略,可以激活场域内行动者的互动效能。

3. 数字化平台

数字传播渠道拓展了场域空间维度,短视频平台、虚拟展厅等数字场域打破了非遗传播的传承边界。数字技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空间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意义正在减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数字技术也更加敏感,且一直在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效服务模式。恩施州各县市积极推进公共文化云建设和服务工作,将数字一体机置于文化馆、非遗展示厅。利川文化网采用“1+3+N”建设模式,整合全市“两馆一站”等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实现远程教育、会议讲座等功能;依托微信“送菜单”服务,开展群众“文化点单”活动。恩施州各县市依托湖北省文化艺术领域的资源,邀请社会文艺团队和文艺爱好者参加线上培训。在抖音平台开通官方账号,进行非遗教学直播,如恩施州文化馆在抖音号上开设“云里土家”进行线上直播教学。在这一语境中,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趋向是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演进。一方面,非遗的普及工程不再与特定的实体空间不可分割,而是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在“云端”进行;另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的服务程序,没有繁琐的搭建舞台、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场等服务流程,而是将文化服务产品直接上传到网上向大众展示,提高了文化服务的可达性和便利性。此外,虚拟空间是数字技术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一种新型治理场域,它依靠各个网络社交平台加强服务供给,采用网上发布、网上直播等形式处理日常事务,并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究其原因,便捷性是其最大优势,虚拟空间节省了文化服务的主客体参与文化服务的成本。

四、结语

非遗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度融合,是一个通过空间重构、主体协同以及资源有效整合来达成动态平衡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应对非遗活态传承所面临的困境,更能为基层文化治理体系注入发展动力,进而促使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实现从形式上的普遍惠及向效能上的显著提升的

根本性转变,为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支点。未来,除了通过以“非遗+”理念重塑乡村文化空间之外,还需加速数字技术与非遗资源的深度耦合,构建数字化传承平台,开发沉浸式传播场景,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非遗活态传承数字档案,实现文化基因的永久保存与创新转化。

参考文献:

[1]格桑翁姆.社区驱动的非遗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以甘孜州德格县麦宿镇为个案[J].中国藏学,2024(6).

[2]黄永林.非遗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责任与协同[J].民俗研究,2024(6).

[3]王磊.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基础、概念界定与价值取向[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4]韩成艳,高丙中.非遗社区保护的县域实践:关键概念的理论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5]高丙中.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15-01/14/content_2804250.htm.

[7]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3/content_5620456.htm.

[8]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9.htm.

[9]陈劲竹,吴理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3(11).

[10]黄永林,任正.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11]向翔.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美[J].求索,1985(1).

[12]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六个特性[J].人民论坛,2011(30).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4]姜亦炜.文化治理在乡村: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浙江六村的庙宇与节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15](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 6 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6](苏联)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7]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8]董晓萍.钟敬文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9]王易萍.从狂欢到日常:牛哥戏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变革[J].广西民族研究,2010(3).

[2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61711.htm.

[2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1322.htm.

[22]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02033.htm.

[23]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03/content_5615106.htm.

[24]洪芳林,龚蛟腾.图书馆全面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4(3).

[25]张曦,冉连.动因牵引、多元协同、流程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践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24(11).

[26]黄永林.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和监管制度[J].人民论坛,2024(22).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8]黄永林,汪瑶.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推动创新性发展——2023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望[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29]陈世香,吴世坤.新时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既有格局与未来方向[J].图书馆,2020(8).

[30](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1]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2/02/content_5457660.htm.

[32]李烨鑫.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2(10).

[33]任维德.“流动公共服务”研究论纲——兼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1).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